

第三期：

## 「自治·運動·本土」



### 《編者的話》

當愈來愈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等官方政策口號失去信心，近幾年蜂湧而起的本土意識不約而同都以鞏固、落實或追求真正的「自治」作為目標。不過，今時今日為「自治運動」奔走呼號的，卻往往對香港自治訴求的歷史緣起不甚了了。為了延續上兩期關於「本土」議題的討論，這一期《思想香港》選刊了三篇文章。第一篇是特約文章，由香港歷史研究者貝加爾撰寫。他從六十年代香港歷史中鉤沉香港第一批提出香港自治理念的人物和政治團體。他們不單曾經為「自治」這訴求組織政黨，發起社會運動，也嚴厲地批判當其時香港的殖民體制和殖民政策。在貝加爾的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到這些香港自治運動的先驅，守持聯合國憲章內關於人權、民主和平等的精神價值，也有他們關於香港如何實行自治的制度藍圖。他們所開創的在殖民地爭取自治的事蹟，雖然讓他們成了香港自治訴求的先行者。但是非常吊詭的是，在往後的香港社運史、學運史書寫，竟然都被全然淡忘掉。在突破了半個世紀中國民族主義史觀的遮閉而重新出土的「自治」，是否又能與自己的前身相認？

第二篇周思中的文章則穿梭時空，從近年香港兩種不同的「本土」概念，談到當年盧卡奇的革命觀，用以反思與對照香港當下兩種(或幾種)不同的「本土」概念。文章同樣觸及如何看待香港的殖民過去，讀者大可與前文對照並讀。盧卡奇說的是「階級意識」，但放在社會主義歷史長河上，卻只有作為「預言式的批判」但最終為「事後的否定」的命運，給淹埋在史大林主義底下。作者要說的是一個「雙重咒詛」的故事，反映此地一波又一波「本土」概念更替的吊詭。周文出自去年六月的工作坊，當時參與者的熱烈的評論與回應，今期也一併刊登。

最後一篇文章出自余振雄手筆，以「覺醒」的想像為題，從阿甘本、施密特和本雅明等人不約而同地開發的「例外狀態」議題出發，暢論當下「本土」及「中港矛盾」底下社會運動的時間觀念及其局限。他用香港近年重複出現的「覺醒」論述來描繪香港普遍存在的抑鬱的精神狀態，檢視在中央對香港「必要時要有所作為」的那種吊詭地常規化了的「例外狀態」下，我們應如何重新審視「運動」及其與「潛能」的關係。他在回應梁寶山的評論時提到一種「不斷覺醒的困惑」：不斷覺醒，不斷焦慮；不斷覺醒，不斷抑鬱。這與貝加爾一文揭示香港一再重新出現的自治運動，形成令人失笑的歷史對位。作者最後呼籲一種不同的時間想像，與上面周文所說的「預言式批判」亦互為映照，打開了進一步的對話和反思空間。

羅永生

## 目錄

題目	作者	頁數
馬文輝與香港自治運動.....	貝加爾	4
本土的矩陣——後殖民時期香港的燥動與寂靜.....	周思中	14
本土眾數的可能.....	梁啟智	22
多元民主運動的可能性.....	林藹雲	24
甚麼是香港自主性的體現？.....	周思中	26
承認本土主義帶來的改變.....	葉蔭聰	28
未來時態下的覺醒想像.....	余振雄	30
社會運動的靈性.....	梁寶山	36
時態式的社會運動思考.....	余振雄	40

## 《馬文輝與香港自治運動》

文：貝加爾

藍色的旗海佔領了香港的大街，一群示威青年高舉着英國殖民地時代的旗幟。他們當中有懷緬英國殖民地統治的，也有以舊有的殖民地象徵，作為爭取香港自治的旗號。這股新的自治運動，以搶眼的藍旗贏得海內外關注，崛起為香港政壇中一支新生力量。然而香港自治運動的歷史不是從這裏開始，而是早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一名叫馬文輝的人開始談起。今天香港人應該從都未曾聽過他的名字，老一輩人或許對他還有少許印象，記得他一身白色的傳統中式長衫，嘴邊蓄着五柳長鬚，扛着眼鏡，拿起煙斗來雄辯滔滔的獨特形象。他們可能在昔日報章上見過這位新聞人物，或曾在大會堂聽過他一席演講。不過又有多少人記得這位略帶傳奇色彩的馬文輝，其實是五、六十年代香港自治運動的領袖呢？回顧馬文輝之自治思想和他昔日身處的香港，對了解今天這急劇轉變中的政治面貌和前途，該有極大啟蒙作用。

### 殖民體制的誕生與挑戰

要了解馬文輝自治思想的起源，我們必先追溯至香港殖民體制的誕生和特性，那就先要從一位來自蘇格蘭的醫生開始談起。這位醫生出生於一七八四年蘇格蘭郊外一個小農莊。雖然早年喪父，他的家庭處在貧困中得到兄長資助，在愛丁堡大學攻讀醫科。他於畢業後加入英國東印度公司，隨公司來到了十九世紀初的中國廣州，當時清政府唯一的對外商港。憑着精明的生意頭腦，這位醫生從鴉片走私市場賺得暴利，一躍成為在華英商中之領袖。道光皇帝派林則徐到廣州禁煙，充公英商鴉片銷毀作回應，這醫生當機立斷，寫信予英國外相巴麥尊子爵（Lord Palmerston）成功遊說英國出兵，又慫恿英軍司令義律（Charles Elliot）佔據香港島。一八四一年，他在這片新殖民地的首宗買賣中投得一塊地皮，開始擴展他的生意。這醫生叫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而這公司則被命名為怡和洋行（Jardine Matheson & Co.）。

自此，怡和洋行一直掌握住香港經濟的龍頭地位，怡和大班及匯豐銀行總經理長期在香港的行政、立法兩局內派駐成員，又在上海租界的市政機關內擁有代表。以香港為跳板，英國的商業殖民帝國北進中國這剛打開的龐大新市場。不過英國人這個遠東帝國版圖歷時僅一百年便遭到戰火動搖。一九四一年日本發動另一場帝國戰爭，英國在遠東的殖民據點相繼陷落，英國人扶植的殖民地精英此時竟轉投與日本人合作，而此時各殖民地的反英國族獨立運動也愈發壯大。英國殖民政府在各地的合法性都受到考驗。

一九四五年納粹德國宣佈無條件投降後，世界各國於六月廿六日聚首美國舊金山簽署《聯合國憲章》，序言便寫道：

我聯合國人民同茲決心，欲免後世再遭今代人類兩度身歷慘不堪言之戰禍，重申基本人權，人格尊嚴與價值，以及男女與大小各國平等權利之信念，促成大自由中之社會進步及較善之民生...<sup>1</sup>

經歷了兩次不人道的慘烈戰禍，世界各國都接受普世的人權及民主作為文明社會的基本原則，而憲章的第十一條更訂明殖民地人民的自治權利：

聯合國各會員國，於其所負有或擔承管理責任之領土，其人民尚未臻自治之充分程度者，承認以領土居民之福利為至上之原則，並接受在本憲章所建立之國際和平及安全制度下，以充分增進領土居民福利之義務為神聖之信託.....按各領土及其人民特殊之環境、及其進化之階段，發展自治；對各該人民之政治願望，予以適當之注意；並助其自由政治制度之逐漸發展。<sup>2</sup>

《聯合國憲章》簽署後的一個多星期，工黨黨魁艾德禮在地球另一邊的英國大選中擊敗邱吉爾。新上台政府成為英國屬下殖民地自治獨立的契機，印度、巴基斯坦、錫蘭、緬甸陸續獲得獨立，馬來亞、新加坡也開始大刀闊斧的去殖民化。香港的戰前總督楊慕琦在中國東北的戰俘營中釋放出來返英休假時，也奉倫敦推行自治之命再次來港。一九四六年，楊督推出了目的為「讓香港市民有更多責任去管理自己的事務」的憲制改革方案。方案建議成立一個新的市議會，以華洋直選代表、專業團體組成的民選議員佔三份之二，並將部份政府部門的權力轉移到市議會，為港人自治鋪路。方案建議增加行政、立法兩局的華人代表，又將立法局的非官守議席增至過半數。楊督也希望起用華人公務員，以取代戰前洋人佔絕大多數的官僚架構。<sup>3</sup> 不過楊督在未完成改革之前便已離任，葛量洪接替後，政府的政改立場頓時起一百八十度轉變。葛量洪指香港人政治冷感，又認為大陸戰局急轉直下，大批難民湧入香港，民主選舉會有利共產黨在香港奪取政權。楊慕琦計劃也遭到怡和大班同時為行政、立法兩局非官守議員的蘭杜 (D. F. Landale)，以及華人律師羅文錦反對。葛督最後成功說得新上台的保守黨政府放棄計劃，香港自治的契機在英國政府以時機不合為由無疾而終。<sup>4</sup>

<sup>1</sup> 《聯合國憲章》. 1945年10月24日. 聯合國. 1 UNTS XVI. 2013年12月1日. <<http://www.unwebsite.com/charter>>.

<sup>2</sup> *ibid.*

<sup>3</sup> Buckley, Roger. *Hong Kong: The Road to 1997*.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27.

<sup>4</sup> Tsang, Steve. *Government and Politics: A Documentary History of Hong Kong*.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5. 89-90.

## 馬文輝和他的聯合國精神

葛量洪終止政改的決定立時遭到好抱不平的馬文輝反對。馬文輝是富商之子，父親馬應彪是香港大型華資百貨公司，先施百貨的創辦人。馬父早年遠赴澳洲打工，後來經營水果生意致富，回港後於一九〇〇年在中環皇后大道中開設先施百貨，為當時香港第一家華資百貨公司。馬父曾經襄助孫文的革命事業，或許是受父親感染，生於一九〇五年的馬文輝熱衷政治，活躍於公共事務，如擔任香港大會堂副主席，香港業務體育協進會及奧林匹克委員會副主席，香港藝術節委員會秘書，又參與香港大會堂委員會、香港音樂協會、香港明愛事業協會等。身為先施少東，馬氏早年長居英國當公司的買手，故受西方民主思潮所影響，又說得一口流利英語，做過葛量洪的即時傳譯。<sup>5</sup>

馬文輝初聽到楊慕琦的政改方案，本以為鴻鵠將至，更與其他社會人士成立不少政團響應政改，如與大律師貝納祺（Brook Bernacchi）成立的香港革新會；以華人為主，後被親共派系奪得領導權的香港華人革新會；由教師會創辦人，喇沙書院校長加斯恩修士（Brigant Cassian）領導的香港公民協會。英國殖民政府的自治承諾落空後，各政團大失所望，馬文輝更聯合五百個民間團體反對葛量洪決定，又邀請他出席公開辯論討論港人是否需要自治，惟葛督拒絕。<sup>6</sup> 而新成立的革新會、華革會則參與港府在五二年重新開放的兩個戰前市政局民選議席選舉，貝納祺更一直斷續擔任市政局議員直至一九九五年退休返英為止。革新會、公民協會也其後一直投身於市政局選舉，成為八十年代現今民主派崛起前香港的兩個準反對派政團。

馬文輝對市政局這個毫無實權的政治花瓶不屑一顧，也沒法向英王宣誓效忠，故此一直在體制外參與自治運動。當革新會、公民協會選擇走溫和合作路線時，馬文輝仍然不遺餘力的高調爭取楊慕琦計劃中的自治承諾，並因此一躍成為香港最有名的反對派人物。他繼續列出多項葛量洪施政失誤，抨擊英殖政府只是聽命於「豪門和既得利益者」，指香港是「富豪階級的天堂」。他又反對一九四九通過的緊急法令，統計當有一百二十個合法組織及十四類人士在此法令之下遭到遞解出境，犯罪組織及黑社會卻仍在逍遙法外。<sup>7</sup>

馬氏在一九五三年一手創辦了聯合國香港協會，希望把《聯合國憲章》內訂明的平等人權、民主，以及爭取殖民地自治獨立之精神體現到這片殖民地上。<sup>8</sup>馬文輝其後一直領導聯合國

<sup>5</sup> “Ma Man-fai.” *Asian Weekend* 29 May 1966.

<sup>6</sup> “Grantham declines public debate.” *The Straits Times* 18 December 1958.

<sup>7</sup> Pepper, Suzanne. *Keeping Democracy at Bay: Hong Kong and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Political Reform*.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8. 132.

<sup>8</sup> “Ma Man-fai.”

協會扶助弱勢，推動政改。協會中最有名氣的活動要數分別逢周日與周三五時於香港大會堂八樓展覽廳，仿效倫敦海德公園自由辯論風氣的「海德公園講座」和「民意講座」，講座議題除政治外，內容包羅萬有，更成為馬氏政治教育和匯集民意的場地。

馬文輝也不只是空談議論，更為貧苦大眾請命，而殖民地政府也盯上了這個好抱不平的異見人士。一九六一年底，政府宣佈徙置屋邨商舖大幅加租，協會便組織商戶抗爭反對。不過那時協會在組織商戶的一個十二人會議細節，竟也詳細記錄於政治部主任彭定國（John Vincent Prendergast）的報告內，可見政府對馬文輝等人甚為戒備。<sup>9</sup> 而且早於六一年署任輔政司的戴麟趾已在政府的秘密檔案中，指聯合國協會的某些成員以協會名義從事違背「公眾利益」的活動，將之納入監控範圍。<sup>10</sup>

一九六〇年，市政局的革新、公民兩會組成聯盟，派團出使倫敦要求重開政改，惟不得要領，而聯合國協會也在六一年發表多項改革的計劃書，向殖民地政府的要求包括有：

- （1） 給予香港所有長期居民一個不分種族、國籍的公民身份，以及投票權在內的公民權利，使在還未廢除的緊急法令下，任何人都可以免於恐懼或任意行動而自由表述意見；
- （2） 免費的中小學普及教育，使所有公民都能學習明瞭和行使民主政府下的責任；
- （3） 分區的民選議會應取代市政局，並從民選區代表可以選出數名立法局議員過渡至直至住滿七年的香港市民直接選出所有立法局議席。<sup>11</sup>

建議書希望給予港人自治，以解決殖民體制下沒有充份及平等的公民身份、公民權利、公民教育。建議書更首次提出普選立法局的聲音，馬文輝恐怕萬料不到在提出普選立法局五十多年後的今天，普選依然離港人遙遙無期。

### 自治政黨的建立和失敗

---

<sup>9</sup>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02.04.1960 - 03.03.1972. HKRS742-18-1, Public Records Office, Hong Kong.

<sup>10</sup> *ibid.*

<sup>11</sup> Pepper. 137.

正當馬文輝在香港創辦聯合國協會爭取自治，新加坡華僑李光耀那邊廂也成立了人民行動黨，爭取新加坡全面獨立。在星馬殖民地政府逐步開放自治下，李光耀領導人民行動黨於五九年新加坡立法議院的首次全面直選中大勝，贏得自治政府的執政權，為正式脫英獨立鋪路。受到星馬自治運動的壯大鼓舞，馬文輝與其他自治派人士效法星馬於六四年籌建了可能是香港史上的第一個政黨，香港民主自治黨。民主自治黨引用了聯合國在六〇年十二月廿日通過的取消殖民地決議、六一年十一月廿八日飭令各殖民地獨立的決議，要求英國落實聯合國之呼籲。自治黨又以六四年馬耳他島脫離英國獨立為例子，指香港人口雖多馬耳他十二倍以上，自治程度卻落後馬耳他極遠。<sup>12</sup> 自治黨在其政綱內為香港自治政府規劃出初步藍圖：

- (1) 設立全部民選的立法局；
- (2) 總督應由女王經諮詢香港各部長後予以委任；
- (3) 總督應接受香港各部長建議而管理內部事務；
- (4) 總督應召請任何大選中獲多數票勝的政黨組成政府；
- (5) 鑒於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城邦，所以一院制的立法局足以擔的必要的立法任務，不需要再另設市政局；
- (6) 香港各區設立一區政局而直接選出至少一個議員參加立法局；
- (7) 英國負責國務、外交，向香港駐軍，但軍隊須交還軍事用地並遷到離島；
- (8) 香港應維持自由港，但政府應加重在經濟事務上的角色，而達至全民就業。<sup>13</sup>

自治黨希望除國防、外交之外，香港人應得到最大自治權利。在政制上，港人可以選出自己的執政政府，英王委派的總督並無實權，模仿類似加拿大、澳洲的政治模式。自治黨又提到在不公平、不合理的殖民體制下，香港於文化、教育、財政、司法、人事等方面皆與時代落伍之處，並成為社會不安和國際指摘的因素。英語作為香港唯一官方語言，變相把不諳英語的大部份市民都排斥在政治事務參與、經濟及社會階梯攀升之外。自治黨認為港府的語言政

---

<sup>12</sup> 《香港民主自治黨籌組經過報告書》. 香港：民主自治黨. 1964年. 8-9頁.

<sup>13</sup> *ibid.* 13.



策是殖民體制中殘留的種族主義。殖民體系下，特權階級的壟斷也造成貧富懸殊，製造階級仇恨。<sup>14</sup> 不過民主自治黨不認同中共的恐怖主義政治，並認為中共共產主義和英國殖民主義皆是不平等的暴力制度，只有民主自治才可改善殖民地的窮困與不公。<sup>15</sup>

可惜進行得如火如荼的自治運動的很快便出現分裂，馬文輝因經常抨擊政府的作風而被溫和派擠出領導層。<sup>16</sup> 另外，英籍教師曾健士 (K. Hopkin-Jenkins) 連同前港府公務員史潔頓 (G. S. Kennedy-Skipton)、鄧漢齊律師不久後退出自治黨，另組香港工黨。曾健士曾炮轟香港為「警察國家」，警察可以任意審問及遞解市民出境，<sup>17</sup> 又曾指戴麟趾應為最後一個英人港督，繼任的港督應當是一名香港人，由香港人民的政府推薦。<sup>18</sup> 工黨主張與英國更密切接觸及更為社會主義的政策，並把反對財閥壟斷、建立公有制等寫入政綱。<sup>19</sup> 接着又到前國軍十六路軍將領孫寶剛又退出自治黨，另組香港民主社會黨，繼承四九年前大陸民主社會黨所行國共以外的「第三勢力」路線，並提倡民主社會主義政綱。<sup>20</sup> 不過三大自治政黨在七十年代皆突破不了千人的組織。工黨雖然發動過多場示威，但由於人數不足而被報章譏為「示弱」，<sup>21</sup> 其後更於七二年停止運作。民社黨也由於經費不足而把機關報《新社會》停辦。<sup>22</sup>

## 天星小輪加價騷亂

一九六六年，聯合國協會副主席，也是市政局民選議員的葉錫恩得到馬文輝發動「壹圓運動」籌款支持出訪倫敦促英廷開放自治。<sup>23</sup> 馬文輝的「壹圓運動」得到平時飽受警察欺壓敲詐的小販踴躍支持，短短半個月已籌得過萬元。<sup>24</sup> 馬文輝又為港人翻譯他們的問題，令港人得而直接向英國的政客提問。<sup>25</sup> 葉錫恩此行與梁永濂大律師合作，先後與殖民地大臣李輝德

---

<sup>14</sup> *ibid.* 8-9.

<sup>15</sup> 〈對香港現狀多抨擊 認為必須改革政制〉. 星島日報 1963年12月22日.

<sup>16</sup> 〈馬文輝被摒民治黨 由於經常抨擊政府〉. 星島日報 1964年9月4日.

<sup>17</sup> "Political party claims HK is police state." *Hong Kong Standard* 22 December 1963.

<sup>18</sup> "A local governor for HK?." *Hong Kong Standard* 19 January 1964.

<sup>19</sup> "HK Labour Party splintered." *Hong Kong Standard* 21 July 1964.

<sup>20</sup> Wong, C. Y.. "The unknown parties fighting for independence." *Hong Kong Standard* 28 April 1974.

<sup>21</sup> 〈滑稽的一幕〉. 快報 1965年6月25日.

<sup>22</sup> Wong.

<sup>23</sup> "A dollar for Elsie Fund is started in HK." *Star* 29 April 1966.

<sup>24</sup> "Elsie fund tops \$10,000 as hawkers pitch in." *Hong Kong Standard* 10 May 1966.

<sup>25</sup> Pepper. 138.

(Frederick Lee)、多位國會議員包括最熱心香港事務的藍堅 (John Rankin, 又譯蘭金) 會面, 力斥香港警察如何以遞解出境法恫嚇異見人士, 貪污瀆職, 以及司法不公、財閥壟斷等問題, 促請英廷設立委員會調查港府, 改革司法制度, 以及開放立法局民選議席。她又以英女王日前的國會演說中「協助餘下殖民地的人民達至獨立或其自由選擇的主權地位」要求英廷遵守承諾, 給予港人自治。<sup>26</sup> 梁永濂又以英國給予直布羅陀自治沒有引起西班牙的佛朗哥政權反對作例子, 指港府不能以得罪中共為由, 不予港人自治。<sup>27</sup>

正當葉錫恩身處英國時, 天星小輪加價引起的騷亂惹來保守派對她的反撲。一九六五年香港經歷一場股災及華資銀行倒閉風潮, 殖民體制中的政經巨頭怡和洋行旗下的天星小輪公司卻於年底在經濟一片蕭條底下申請頭等艙加價五仙。天星小輪在七二年紅磡海底隧道通車前一直為普羅市民來往港九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天星加價消息惹來社會各界一致反對, 馬文輝率聯合國協會匯集民意, 發動輿論攻勢。身為交通諮詢委員會成員的葉錫恩發動簽名請願運動反對加價, 但交通諮詢委員會除了葉錫恩反對外, 竟在六六年三月以十四比一大比數通過贊成加價。<sup>28</sup> 在缺乏民主政治之下, 政府與民意竟然有如此巨大落差, 引來輿論嘩然。政府此時更公佈薪俸稅、廉租屋租金等一系列加價措施, 在民怨上火上加油。

四月四日, 中環天星碼頭前出現一名藉藉無名的青年。他戴着一副深黑色眼鏡, 反穿一件黑絲綢襯裡的校褸, 上面用白油漆上示威標語: 左臂寫上「democracy」, 右臂寫着「支持葉錫恩」, 背部上半部寫上「Hail Elsie, 絕飲食, 反加價潮」、下面寫上「Join hunger strike to block fare increase」。不肯透露名字的他聲稱會堅持絕食, 「直至撤銷天星加價, 或者至餓暈為止。」<sup>29</sup> 記者後來才知道他名字叫蘇守忠。

這位特立獨行的青年深受六十年代反殖、反帝、反越戰的國際思潮影響, 而且比六八年五月巴黎的學生更早上街。他的自發行動吸引了盧麒等青年加入。四月六日蘇守忠被警察以阻街為名拘捕。盧麒等在九龍天星碼頭發起遊行, 引來途人爭相加入。這場和平示威卻在翌夜演變成暴力騷亂。殖民地政府出動軍警鎮壓, 並實施宵禁, 最後共拘捕一千多人, 鎮壓當中誤打死一名途人鄭潤祥。

<sup>26</sup> “Elsie hands in HK report.” *Hong Kong Standard* 19 May 1966.

<sup>27</sup> “Hyde Park Forum.” *Hong Kong Standard* 30 May 1966.

<sup>28</sup> 區志堅, 彭淑敏, 蔡思行. 《改變香港歷史的60篇文獻》. 香港: 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2011年. 241頁.

<sup>29</sup> 〈天星碼頭青年絕食反對加價〉. 明報 1966年4月5日.

盧麒被拘押後在騷動的調查委員會聆訊內大爆警察濫用私刑，屈打成招，強迫他簽字承認收葉錫恩錢發動示威。<sup>30</sup> 葉錫恩早已因揭發警方貪污不遺餘力而跟警方結怨。葉氏因此遭到親政府的保守派報章如《南華早報》等攻擊，更把騷亂冠名為「葉錫恩之亂」，葉氏出庭作供時更被多番質問至淚灑公堂。<sup>31</sup> 盧麒在審訊前竟在元朗被控以「企圖偷單車」重判入獄四個月，出獄後被發現吊死於牛頭角佐敦谷徙置大廈寓所內。有傳盧麒屋內有被搜掠過的痕跡，而且死時屍體是跪在地上。馬文輝與葉錫恩、蘇守忠都質疑盧麒之死別有內情，又為之舉行公祭。<sup>32</sup>

蘇守忠在反天星加價騷亂的一周年為響應英國哲學家羅素 (Bertrand Russell) 的核裁軍運動 (Campaign for Nuclear Disarmament) 再次上街，<sup>33</sup> 與友人遊行到旺角鄭潤祥喪生地點致祭。他左手持一花圈，悼念騷亂死難者鄭潤祥與盧麒，右手拿着印有美國國防部長麥南馬拉 (Robert McNamara) 的英文報紙紙牌，上書「懲辦戰犯」，<sup>34</sup> 哀悼在越戰中喪生的平民，又反對香港被美國用作為越戰的補給基地。<sup>35</sup> 蘇氏結果被警方以非法遊行、阻礙交通、阻差辦公三項罪名拘捕，更因此被法庭判往青山精神病院檢驗兩星期。反天星加價的抗爭者最後都遭受不同程度的懲戒，只有曾計劃發動「壹圓運動」幫蘇守忠打官司的馬文輝幸保不失。不過在天星小輪獲總督會同行政局批准加價後，馬氏也自此坐船時拒絕乘坐上層以示抗議。

## 迷失的一代

九龍騷動調查委員會後來發表報告書，指參與騷亂的大多是教育程度低、工資低、居住環境差的青年，總結港人面對政治、經濟、社會的挫敗感是騷亂之直接成因。報告指英語作為唯一的官方語言，而又為絕大部份市民所不認識，加深了官民間之鴻溝，<sup>36</sup> 與之前自治黨提出在殖民體系下，語言政策導致種族歧視的問題不謀而合。報告又指權力過度集中的政府在地區幾乎不見蹤影，市民難以向之求助。<sup>37</sup> 九龍騷亂其實反映了充滿殖民主義色彩的語言政策、壟斷和封閉的政治經濟體制都令被殖民者對殖民者出現極大疏離感，加上停滯不前的政

<sup>30</sup> "Inquiry he was Lo Kei tells never paid by Mrs Elliot."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29 May 1966.

<sup>31</sup> 杜葉錫恩. 《我眼中的殖民時代香港》. 香港: 香港文匯出版社. 2004年. 114頁.

<sup>32</sup>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sup>33</sup> *ibid.*

<sup>34</sup> 〈蘇守忠被捕〉. 華僑日報 1966年4月8日. 5頁.

<sup>35</sup> United Nations Association of Hong Kong.

<sup>36</sup> *Kowloon Disturbances, 1966: Report of Commission of Inquiry*.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7. 127.

<sup>37</sup> *ibid.* 127-8.

制改革、官員的貪污腐敗、經濟社會的不公也令港人難以對英國殖民政府產生歸屬感。這些馬文輝早已提出過，沒有民主自治解決的社會問題，最終也令殖民者以至整個社會付出了代價。

盧麒的悲劇也反映出當時佔有香港人口一半的青年，他們普遍面對沒有出路的迷失和困境。盧麒死後警方在其寓所內發現兩封遺書，裏面便寫道「今次盧麒非死不可了。難以傳奇性的絕處重生了，怎麼辦呢？飯又難找吃，當局又說我不適應此社會」、「我是半天吊的，我失掉了母國的倚靠，無主孤魂的到處漂浮，心靈的創傷，直至永遠？還是短暫的？」等字句。<sup>38</sup> 失去了「母國」中國的國族身份，但又對英國殖民身份沒有認同。「半天吊」的「無主孤魂」論，與馬文輝所稱香港人的迷失身份不謀而合。雖然馬文輝與盧麒都沒有拋棄其中國人身份，但馬氏便指香港華人並不為大陸或台灣的中國政府所接受，是無國家身份也是不可識別的。因此他認為港人應該生於斯長於斯，而且死於斯，建立一個屬於港人的自治政體。<sup>39</sup>

正當六六騷亂醞釀及發生時，港督戴麟趾也成立了工作小組檢討地區行政制度。工作小組主席狄堅信 (W. V. Dickson) 隨後內部提交了報告書，建議成立以民選佔多數的區議會，處理地區上的教育、福利、發牌、廉租屋事務，更允以財政獨立。<sup>40</sup> 狄堅信報告書最終再次被倫敦及香港政府以會挑動中共政府神經的可能為由否決。<sup>41</sup> 一九七一年麥理浩接替戴麟趾出任港督，仍然拒絕開放民主自治。面對殖民地政府的充耳莫聞，香港與其他英國殖民地的命運愈走愈遠，馬文輝和自治運動亦逐漸沉寂下來。然而馬文輝等人於五、六十年代帶起不畏強權的抗爭風氣，直接影響了蘇守忠一代的青年，而蘇守忠當天在天星所樹立反殖民權威形象，也由七十年代保釣運動、中文運動、反貪污捉葛柏、文憑教師薪酬運動、金禧事件等，一浪接一浪的民權運動所承繼。這群青年在參與社會抗爭中塑造出公民意識，而在社會和經濟的逐步改善及富裕當中，當初的迷失一代竟也從絕望之中慢慢建立起新的身份和意識。

一九七九年，麥理浩訪問北京與鄧小平會面，首次得悉中共九七年接收香港的立場。麥督回港向記者否認見過鄧小平或談及過九七問題，卻在八〇年推出了《香港地方行政的模式綠皮書》，正式啟動了從一九五二年葛量洪推翻政改方案開始，推遲了近三十年的民主改革進程。<sup>42</sup> 一九八五年，馬文輝爭取多年的立法局選舉終於出現。就像五〇年代一樣，各個民主

<sup>38</sup> 〈法庭裁定盧麒死於自殺〉. 工商日報 1967年6月1日. 6頁.

<sup>39</sup> "Membership of self-govt movement dwindles to 7." *Hong Kong Standard* 8 September 1974.

<sup>40</sup> *Report of the Working Party on Local Administration*.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 1966. 73.

<sup>41</sup> Faure, David. *Colonialism and the Hong Kong Mentality*. Hong Kong: Centre of Asia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003. 229.

<sup>42</sup> Faure, David. "Prelude to 1997: notes on Hong Kong's future under Governors Trench and Maclehoose."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ee Sau Kee Building,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27 April 2012.

派團體如雨後春筍湧現，投身各級選舉。直至九一年李柱銘、司徒華等人成立香港民主同盟，竟被稱為香港的第一個政黨。民主自治黨和馬文輝的故事，到此竟然完全被人遺忘。九五年立法局終於推行全面直選，可惜馬文輝卻已於一年前逝世。這個他一生致力爭取的目標，不幸未能親眼見證。

## 結語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英國的殖民地旗徐徐降下，中共官方聲稱香港已經「回歸祖國」，從殖民地變成一個特區。中共將九七描寫成的一個殖民地與其國族統一的過程，這是否代表了香港的殖民身份和體制已經消除？我們看到馬文輝在五、六十年代爭取自治的內容，都是希望以民主自治去消除殖民體制下政治、經濟、社會的不公，鄧小平承諾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似乎都回應了馬文輝自治運動的訴求。然而民主自治的制度，並沒有在殖民地旗降下時實現。今天八、九十年代興起的民主派就普選承諾跟特區政府之角力，與五、六十年代興起的自治政團就自治承諾跟殖民地政府之周旋，竟然出奇地相似。馬文輝的年代所反對的殖民體制依然殘存於今天的「港人治港」政府中，並造成社會不安的因素。諷刺的是，與當年殖民地人民對英國殖民者感到疏離一樣，今天的香港人竟然也對自己祖國產生疏離甚至抗拒，相反地，他們當中甚至用上了上一代自治運動所反對的殖民地象徵，作為新一代自治運動的旗號。昔日馬文輝等人所反對的外來殖民政權，在今天竟比自己的政府更有歸屬感？

馬文輝雖然去古已遠，但他當年所發起的自治運動，在今天看來卻依然有待達成。而馬氏之事跡和思想，更值得讓我們跟今天的香港作比照，以了解香港人身份的轉變和遺留的問題。慶幸的是，回顧六十年代殖民地下的迷失一代走到盡頭時，最後卻依然能誕下燦爛的八十年代，這或許對我們今天面對前途愈覺暗淡莫測的香港時，都有積極鼓勵的作用。

【貝加爾：西雅圖華盛頓大學歷史系及哲學系本科畢業，碩士在中大歷史系就讀，對香港史有興趣，原名林文瀚。】

## 《本土的矩陣——後殖民時期香港的燥動與寂靜》

文/周思中

零三七一至今剛好十年，這十年來，香港政界和社會運動可稱車水馬龍絡繹不絕。本文嘗試以近年的本土（眾數）運動為軸心，斗膽討論香港的時代問題。

### 一、哪種政治？

香港並不是一件可移動的實物，「回歸」也就不涉及任何空間條件的變化；反之，「回歸」二字屬時間範疇，指向殖民階段的結束，香港主權收歸中國。然而，民族主義史觀的失而復得邏輯，並不必然重疊於解殖框架裡的自主主體，殖民地狀態的中止，並不等於向香港主體性開綠燈。若香港回歸後進入了一個名符其實的新時代，這時代特定的歷史思考，便在於香港的自主性應如何定位，座標是甚麼。中國經濟起飛，各種「大禮」源源不絕，這就是香港自主性的條件嗎？透過接收各種經濟上的優待，與內地建立更緊密的經濟合作關係以至民族感情，就是擺脫及反省殖民地的遺留嗎？懷舊和抗共是不是第二條路？空間規劃及社會政策上與內地區隔，維持回歸前的管治及文化格局，在回歸後的時空是甚麼意思？有沒有第三條路？

以皇后碼頭為例，由政府到歷史學者到不少平民百姓都認為，這是殖民地的象徵，將之鏟平建成大馬路和商場，既移除殖民符號又促進經濟發展解決中環交通擠塞，豈不相得益彰？問題是，假使殖民地年代殖民者對香港人爭取公民權工人權平民百姓生計權拖得就拖，而特區年代的統治者繼續複製這種管治關係，貧富懸殊背景下的經濟發展究竟是延續舊有的結構，還是對之的超越？

將「本土」定位在突破懷緬殖民地的舊日子與重回母體擁抱內地經濟機遇這組假對立，進路難免有點迂迴，但迂迴的盡頭，卻是解放的視角——解放出主權回歸就是解殖，懷舊反共就是自主的雙重幻覺。反高鐵及保衛碼頭的幾年運動，在具體運動目標之外，就是嘗試釋放這種時代可能性。

然而，圍繞著「本土」的論述及民情，當然不一定困於這組問題意識內。事實上，為協助本港走出千禧年前後亞洲金融風暴及沙士所帶來的經濟低迷，內地與香港於2003年簽定《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簡稱CEPA）。從此，由電影到自由行，由會計銀行到採礦相關的服務，由翻譯到鐵路運輸，由教育到醫療到會展到社會服務，香港都有

優待[i]。由2003年到2011年，香港的人均生產總值由十八萬元上升至接近二十七萬元（當然，代表貧富差距的「堅尼系數」，香港幾十年來持續增長，而且名列前茅）。這不啻是祝福和詛咒的雞尾酒：當香港人正從低迷的經濟喘過氣來時，突然發現藥房的奶粉被搶光了，上水火車站被水貨客擠滿了，醫院產房的設備都給雙非孕婦預約了，房地產給暴發戶炒得不亦樂乎，市區著名的購物商場聽到的全是普通話，連入電影院都被迫要看沒有鬼神及黑社會的合拍片。

香港在中央政府大力輸送各種「好處」的情況下，有口難言。所謂「本土」，在這社會氣氛之中，便難免由先前批判歷史麻木的角度被重新轉化。而轉化的方向，卻是走向某種訴諸情緒及自我保護的意識：簡言之，香港就是本土，內地就是他者，但這裡的他者並不邊緣，而是財大氣粗力拔山兮。反之香港才是那告急、憤怒、冤屈、反撲的主體。這種「本土」觀點以文化評論人陳雲的「城邦自治論」為理論基礎，以「香港自治運動」為組織平台，大幅使用臉書之類社交網站為活動空間。兩種「本土」不僅語意有別，組織形式、政治目標迥異，兩派之間甚至互相敵視，以「左膠」和「法西斯」之類稱呼互相攻擊。顯然，在目前的社會經濟氣氛裡，談本土而不反雙非自駕殘體字，難免有投共之嫌，殖民地時期的官僚、司法制度等「核心價值」，不假思索之下，亦隨時成為香港唯一值得捍衛的優越感。

兩種本土，究竟是甚麼關係？比較兩種觀念，前一種本土反思後殖處境，以建立（將臨的）解殖主體為目標，後一種本土，其實不過將本土重新挪移回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對立面，將時間維度剔除，殖民遺產由需要批判地反思的對象，吊詭地回朝成為我們甚至要捍衛的政治及文化基本結構。但從歷史發展來看，以城邦自治之名的本土，卻是出現於以解殖為任務的本土之後，這先後次序的意義是甚麼？是城邦本土揚棄了解殖本土，排斥性的本土才能直達本土的真意嗎？回歸後的香港，究竟需要哪一種政治？

#### Detour：燥動和寂靜的二十世紀

馬克思的史觀當然是唯物及辯證的，歷史發展透過生產力的發展由封建主義到資本主義再到社會主義。每個階段對上個階段的否定，都進一步示範歷史發展的真相。但若我們將顯微鏡對焦在馬克思主義的領域，到底由馬克思建立學說，到列寧十月革命推翻封建沙俄建立地球上首個社會主義聯邦，再到史大林極權鎮壓異見的大災難，又是否客觀必然？又或者，道出了馬克思主義的真相？這就是齊澤克在其為匈牙利哲學家盧卡奇（Georg Lukacs）編輯的《A Defens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s》裡所提到的問題[iii]。





當社會其他階級都能以其所擁有的財產、地位，定義自身在社會的位置時，盧氏認為，吊詭地，無產階級的核心就是「無」或被剝奪。其社會位置的特徵就是「脫臼」。無產階級這特殊階級的「脫臼」性質，亦正是其之於社會其他階級的普遍性維度。因此，無產階級的人數多寡，並不充份決定這階級是否具備普遍性；從總體性的觀點看，資本主義社會的暢順運作，必需建基於對無產階級的系統性剝削——這就銘刻了無產階級之於社會的普遍性，也是扭轉改寫資本主義政治經濟關係的關鍵階級。要實現其主體性，無產階級並不是要確認其實存的社會位置，然後向資本家要求更多的福利或更好的勞動條件，而是以無產階級為阿基理德腳跟，根本地扭轉資本主義的社會關係及配置。

在這意義下，相對於歷史發展客觀必然的決定論，他認為革命更需要強調主觀性，這主觀性體現於能否體察鬥爭的戰略性時刻，結連的對象等。革命不能等待所謂「客觀時機」成熟，因為資本主義的強項是動員各種資源（包括殖民阿非拉國家，剝削其天然及人力資源，補貼歐洲工人緩解危機）吸納消滅反對力量。革命的注碼就是在「條件未成熟」情況下的突襲，創造新形勢，改變不同力量之間的「客觀」關係。換言之，「條件未成熟」下的介入，並非平白撞牆，而是為了改變「條件未成熟」這判斷的標準；又或者，貨真價實的革命事件，從來不可能化約為單純理論及客觀條件等因素可以計算及預測，無論如何化約都總餘下主觀判斷、意志的維度。

在齊澤克眼中，這就是盧氏列寧主義哲學的高峰。盧氏清醒地把握到無產階級革命的動態內核：不能假設工作崗位是工人者便有無產階級革命意識；此外，不能假設歷史發展會按某個客觀的藍本進行。這兩個關鍵環節，卻恰好是二十世紀初大部份歐洲國家馬克思主義的前提。這些無法假設的環節，對盧氏而言便是共產黨的鬥爭場域，行動、政治之所在。此等觀點的實際體現，就是十月革命。沙俄當時的情況未有按馬克思所配方的先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然後才有無產階級革命，而是列寧將沙俄與無產階級革命直接短路，在俄羅斯的資產階級基礎及工人階級基礎同樣尚未完全鞏固之前，便把握時機建立蘇聯政權。

### 三、預言式的批判（及事後被否定）

這就是盧卡奇的列寧主義革命觀，事有湊巧，盧卡奇發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一九二三年，剛好是列寧多次中風的一年，史大林乘勢抬頭。雖然「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被史大林奉為國家官方意識型態，由革命黨過渡到執政黨，革命理論亦被改寫為治國的合法性基礎。

這新形勢亦啟動了對盧氏理論的批判。批判圍繞著辯證法的適用範圍：源於對大自然觀察的辯證法，是否適用於社會？盧氏的批評者認為在自然界生效的辯證法同樣決定社會的變化，

因為社會按客觀的規律變化，強調意志就是否定歷史發展的客觀必然性。盧氏在《歷史與階級意識》的觀點當然認為辯證法不能直接由自然界搬字過紙，社會變化更替與自然界有別，社會屬於人類意識範疇，政治行為及革命並不能化約為客觀定律的推演。盧氏建基於列寧主義革命觀的觀點，在史大林當權的氣氛下，便被定性為唯心主義而遭否定。

新形勢下，馬克思主義由挑戰封建制度的革命理論化身為治國的意識型態及合法性基礎，強調專政的客觀必然性，當然比強調革命意志更重要。列寧主義的先鋒黨領導群眾，乃出於革命這總體目標，到史大林時期，當革命不再是黨領導群眾的原因時，黨與人民的同一性就成為唯一的統治合法性，以至高壓統治的理據。列寧主義整套革命觀念建基在「脫臼」、被系統性排斥的無產階級，以及在未成熟／不可能的環境下迫出可能性。史大林主義時，列寧的問題意識已不再適用，共產黨及無產階級已成為國家的統治者及「主人」，政治問題也不在於迫出可能性，而是如何守業、借勢、用勢了。

在這意義下，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早在史大林主義的高峰前已事先提出批判。這預告了盧卡奇不僅無法在史大林年代重申其列寧主義觀點，列寧之於整個馬克思主義思想的重要性，更會隨著盧氏彷彿被靖綏而一併埋葬在對史大林主義的攻擊中。

#### 四、港版雙重詛咒

從二十世紀共產主義運動看香港（而又不特別針對香港的左派政治），表面看難免有點不倫不類蚊脾牛婢。筆者嘗試提出的問題是，經常被掛在口邊的「政治」兩個字，到底在甚麼地方？盧卡奇及列寧的經驗，說明政治發生於不可能的地方，又或者，只有在條件不許可的情況下才有嚴格意義的政治行動（或稱革命）。

回頭看香港，零三年七一五十萬人大遊行，宣告了香港民間社會的興起，無論當年開始遍地開花的網絡電台（以至後來新興政黨如公民黨、社民連及人民力量等都紛紛效法，辦網台作為其官方喉舌），以至零五年反世貿韓國農民抗爭啟發了往後許多街頭抗爭的態度及形式，零七至零九年間保衛天星皇后碼頭、反高鐵保菜園等，運動的核心組織者甚至都並非職業傳統工會和政黨人員，組織及資訊傳播都不依賴其組織機器。運動沒有向議會政治匯流的傾向，或突入的動機。

更顯著的是一個名為「社會」的場域似乎嶄露頭角。在這場域裡，行動者面對多重的攔截：一直以來只希望把人民封鎖在無根狀態及消費意識的殖管治、樂於接收及延續這種管治，同時不斷嘗試以「中國市場」引導／創造新型中港關係的特區政府、政治上不斷推延阻止香港人政治民主選舉權的中央政府。香港回歸後不斷強化的市區重建、中港融合空間規劃、國

民教育等政治經濟上的大興土木，就不過是多重攔截的實證表達形式。幾年之間，行動者在街頭在碼頭在農村檢回屬於「本土」的碎片，以解殖作為思考方向的「本土」，就是在這裡萌芽。這種本土觀念的注碼，是某種從未出現／一直被禁止的身份認同及主體意識，以香港人（哪怕只是一部份香港人）一直以來抵抗殖民地政府在政治、經濟、社會及文化上壓制的傳統，奠基香港殖民地管治撤出後的主體輪廓。

這種主張一旦碰上排山倒海的內地議題，在自由行帶動的新形勢下，「本土」的語用便從歷史反省的維度猛然倒退到某種九七年前的滄白恐共對立：醫食住行等種種生活範疇統統仿如既倒。當盧卡奇為了反駁不必等待資本主義發展，不必等待工人的數目成為社會大多數時才能發動無產階級革命，他指出無產階級的普遍性維度不在於其人數多寡等樸素簡化的標準，而在於系統性的排斥及否定才是無產階級普遍性的烙印。這是超越數人頭式的形勢評論／分析，哲學地系統地尋找問題的槓桿支點。我城的本土論述卻由反省歷史經驗勇武地變為檢視甚麼人拿甚麼地方的護照。「本土」的口號性及民粹性操作，徹底取代了反思及創造的維度。

為了提供論述的合法性，為了建構外部它者從而創造自身，後一種本土裡香港歷史的時間跨度亦大幅縮短，未有自由行未有CEPA的香港，彷彿就是所謂「中港區隔」的理型，就是香港人的鄉愿。由於遊客、熱錢、水貨、樓價等的衝擊太過猛烈，這種版本的「本土」論述高度情緒性，「區隔」、「對立」、「拒絕」、「趕走」等用語全部成為建立香港「本土」的關鍵動詞。或許真的是香港的住宅單位、醫院床位、郊野公園露營區、油尖旺購物區的行人道都擠滿了來消費的內地人，但惹起的恐懼和拒絕卻連殖民地教導我們土地空間不過是商品的記憶都擱置一旁了。批判殖民地管治，在這種集體情緒中，要不是不痛不癢，就是投共和大中華左膠了。解殖本土的批判對象，在自治本土同樣對當前形勢的反對聲裡，完整地保存下來，並成為堂皇的反對立足點。從這意義看，香港情況雖然覆蓋範圍較小，本土論述的解殖維度，卻同樣遭遇類似的雙重詛咒。

##### 五、未解答的問題，或，抵抗虛無

誠然，「解殖」是高度抽象的概念，而「本土」與「解殖」的關係，更是難以入屋；反之，乘著內地人及資本大舉流入香港的勢頭，將「本土」扣連為區隔的主張，是審時度勢見風駛輊的realpolitik（「現實政治」）。恐共、仇共、小農DNA、強國人隨地大便不排隊，多麼熟口熟面的批評。問題是，處處以現實政治操作為律令的自治本土論述，其城邦自治的政治主張，卻是以（等待）中國解體為前提。這當然就是現實政治的「現實」，不提「港獨」、不提篡奪中央政府政權（甚至不支持中國政體民主化）。自治本土談政治而鮮提組織及行動，儘管言論惹火，甚至將包圍上水火車站水貨客的行為視為勇武，論及政治卻一切等待那

只能靜靜等待的中國解體，然後回到中國華夏文明及英國文官制度及金融系統，這場運動的內容是——等待。

香港對於中國民主運動應有的角色，當然需要另文討論。但香港本身需要甚麼轉變？不轉變似乎就是理想，在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的論述裡，值得留意是關於經濟制度的提法。其圖像是香港應保留金融系統，甚至特別強調其協助中共富人「在香港寄存和管理財富」[iv]。產業結構上，自治運動的總綱又說：「所謂農產自保，是保存若干本土農業為農學知識基礎，並擴大香港的農產輸入來源的多元性」[v]。香港當然需以保存本土農業，甚至扭轉農業低下刻板形象，但協助中國富人寄存和管理財富，不正是目前香港最維生及致富之處麼？內地暴發戶在香港買樓買金買股票，不是因為炒高物價而令「香港人」水深火熱的元兇嗎？香港土地乃商品的觀念，炒樓為發達途徑，難道不是英國殖民者觀乎香港天然資源不多的情況下，以各種政策在殖民地時代大力推動的意識型態麼？但若自治的香港不發展一定百分比的農作物自給率，而只繼續依賴賺錢賺外匯購買入口食物，無疑是對香港社會的歷史發展缺乏反省。

在另一篇文章裡，陳雲又批評公民黨協助外僑居留權的申請權打官司，是恐懼民粹政治死抱法治主義[vi]，但這立場與自治運動總綱裡說「保留英國的典章文明」，矛盾應如何排解？數碗數碟，並不為了指出城邦自治論的概念特別多自相矛盾前言不對後語。事實上，總綱提到「促進香港食水自主、農產自保及食物安全，重振本港工業，保護本土企業（如中小企），並支持發展新產業」等，字面上完全是應有之舉。問題只是，城邦自治的「本土」，有否認真反省殖民地經驗及遺產，如何同時造就今天大家都懂得唸口禡的「核心價值」與大部份今天香港親歷的「危機」，其實不過銅版的兩面？抑或中共當前，英治時期一切「核心價值」就都照單全收？不敢觸碰當前主權國，就退守惜日宗主國，是靜態的，宿命的。懷舊的情懷容或流行，但這是殖民政權撤出後香港的未來嗎？

## 六、結語

馬克思引述黑格爾有云，重大的歷史事件總會發生兩次，第一次是悲劇，第二次是鬧劇。當然，近年對黑格爾的閱讀已開始將他從歷史發展目的論桎梏中釋放出來，不再存在超然物外的歷史判官，操縱著歷史的發展軌跡。故近年有關本土論述的演變，雖然有其特定的條件和邏輯，卻不必然指向悲觀及虛無。難道不只是如此，我們才能避免問到諸如：解殖的本土觀點是否過時了？是否給反蝗反雙非的本土觀點擊敗了或抽水收割了？相反，該問的問題是，今時今日一片仇恨的氣氛裡，我們能否不在對手定義的戰場，作「嚴格意義的行動」？

從事後的眼光看，盧卡奇在史大林時代的確沉默了，但亦正在這後來的沉默中，顯出他列寧主義時代思考的銳利及前瞻性。他批判的觀點或許沒有協助建築任何實證的現實，但卻能成

為超越時代的拷問。珠玉在前，關於解殖的本土，未完的思考就是未完，不會因為話題已轉而神通地完滿解答。這當然不是答案的全部，但不能輕易回答的問題，難道不是答案重要的構成部份麼？

---

[i] 見工業貿易署，「CEPA專題網頁」[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http://www.tid.gov.hk/tc_chi/cepa/)

[ii] 根據黑格爾的辯證法，齊氏在書裡提出了一套哲學版本的演繹：

圖示（「--」為同一性關係）：

- 1) 馬克思：無產階級 – 歷史發展（中介：馬克思主義政黨）
- 2) 列寧：先鋒黨 – 歷史發展（中介：無產階級）
- 3) 史大林：蘇聯共產黨 – 無產階級（中介：歷史發展）

馬克思主義就是強調無產階級本身等同於歷史發展，其身處的社會經濟位置便預告了革命的發生，政治組織（例如共產黨）不過是特定中介，協助本身有這種意識或潛能的工人階級實現革命等歷史發展。二十世紀初的列寧主義，則是否證了原先共產黨作為中介項的關係。列寧認為，以十九世紀的經驗來說，若不給予任何領導，工人最多只能發展出工會意識，即爭取福利、改善工作環境之類，而不是無產階級革命意識所指向的推翻資本主義及執政。專業革命家才是歷史發展的關鍵，他們組成的共產黨與歷史發展之間才是實至名歸的等號。是先鋒黨先掌握了歷史發展的機會及軌跡，才能領導廣大的無產階級成為推翻沙俄政權，建立蘇聯。在先鋒黨及歷史發展的同一性關係裡，無產階級才是中介。到了史大林，他進一步將否證了無產階級這中介項。在馬克思主義從革合理論化身成替蘇維埃政權提供合法性理論的這背景下，中介項由無產階級變為歷史發展。黨洞察形勢領導群眾起義的功能退下，史大林主義的當務之急是如何鎮壓異見之餘同時向外宣稱仍然代表廣大人民。以前面的概念來說，建構共產黨和無產階級的同一性就是其統治的依據，所謂「歷史發展」只不過是口實性質的中介。

Slavoj Zizek, "Postface: Georg Lukacs as the philosopher of Leninism", in G Lukács, A Defenc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London, 2000)

[iii] John Ress, "Introduction", in G Lukács, A Defence of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Tailism and the Dialectic (London, 2000). p.9

[iv] 陳雲，〈香港城邦 中國門戶〉，刊於《AM730》2011年3月22日。

[v] 陳雲，〈堅持香港自治 保衛自由城邦—香港城邦自治運動總綱〉，[http://hkam2011.blogspot.hk/2011/06/blog-post\\_25.html](http://hkam2011.blogspot.hk/2011/06/blog-post_25.html)

[vi] 陳雲，〈中產創傷，民粹抬頭〉，2011年11月8日，<http://hk.news.yahoo.com/blogs/sandwich/%E4%B8%AD%E7%94%A2%E5%89%B5%E5%82%B7%E6%B0%91%E7%B2%B9%E6%8A%AC%E9%A0%AD.html>

【周思中：半農半X一年多，其半X包括大學助教、獨立媒體記者、電影評論、社運分子……】

## 《本土眾數的可能》

評論人：梁啟智（標題為編輯所加）

周思中的這篇文章，明顯刺中了近日一個重要議題，就是在現今香港社會上有多於一個關於「本土是什麼」的定義。近日陳允中有篇文章談到，一個是「土著本土派」，另一個是[原有的]「開明本土派」。糟糕的是，不少人都發現，新來的本土論述好似蓋過了原先的第一套。這第二套論述對歷史完全不做梳理，要麼完全否定，要麼完全接納。這是周思中在文章中所提到的一個重要問題。但是，周思中指出這個問題後，他立即把話題跳去討論外國的歷史，討論盧卡奇的歷史與階級意識。

文章提到，辯証法不能從自然界搬過來使用，政治行為又不能化約為客觀定律以作推演。所以假若發起政治行動的條件不存在，我們便要為其製造條件。當然，這一套說法與當年列寧時代有相當密切的關係。直至史太林當權的時候，這一套說法就被定性為是一套唯心主義，並遭到否定。周思中指出，談這段歷史是想帶出「預言式的批判」及否定。當說明完這一段歷史，周思中把話題拉回本土的討論，並指出本土論述的爭奪與剛才所提到的那一段歷史有密切關係。周在文中提出「雙重詛咒」的想法：本土本來有一套論述，且目的是嘗試處理解殖的問題。但隨後突然有一套更來勢洶洶的本土論述出現，但這一套新的本土論述在處理解殖的問題上十分蒼白無力。

我相信在座有看過城邦論的朋友應該都能了解蒼白無力在哪兒。例如它一方面認為英國的法治及政治上的平等都是好東西，但城邦本土派人士的行動與實踐，又似乎跟他們所歌頌的精神不一致。為了要達致族群區隔的目的，人權等議題都可以拋開一旁不顧。這套城邦本土論述又有多尊重英國的法治精神呢？這是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則是對於中國的未來，城邦本土派同樣也含混不清。它主張族群區隔，但是，族群區隔以後的下一步該怎樣做？相信讀者慢慢看下去都會萌生一種猶如看科幻小說的感覺。根據這個城邦本土派的推演，它相信之後中國的政權最終會瓦解。……在有關新界東北的文章中，陳雲提到將來難民都會湧去新界東北，那裏將會佈滿難民營。因此，假如新界東北發展，周圍都建滿大廈的話，將來就會沒有地方設置難民營。……它無論是對中國還是英國的態度，均明顯地與第一套本土派論述不同。這套說法並不想去處理那些解殖問題……這又何嘗不是[周思中]所說的一套「預言式的批判及事後否定」？

周思中在他文章結尾再提盧卡奇，指出貨真價實的革命是不應該受到條件不成熟所限的。相反，在條件不許可的情況下，才有嚴格的政治行動。我們不妨討論一下，這一嚴格意義下的政治行動其實是什麼。解殖的行動又是什麼？

第二套本土論述的出現是客觀環境所造就的。如果我們能參與香港的政治，或者能參與中國的政治，那些問題就不應該成為問題。但是事實正正是因為我們無法參與，即使我們已經努力了二、三十年。但是，現在這些問題已不再是想像中、假設的問題，而是活生生在你面前的問題。

最後，就是這篇文章的主題——「本土的矩陣」，以及文章開首的第一句提到「本土」並括上了眾數。這兩件事我都想了許久，因為在英文語境內，眾數是只要多於一個就是眾數。但中文語境卻有點不同。中文有云「無三不成幾」，那麼周思中這樣提出是否表示本土派其實是多於兩派？尤其是他特別提出「矩陣」二字的時候。……假如我是要去理解本土，而這本土其實是眾數，是有好多不同種類的本土論述，那我們的想像是否也可以擴闊一點？而我們的回應又是否可以多樣一點？只要稍為對過去作一點回顧，就會發現，城邦論裏面的不少說法其實自香港七、八十年代已出現，而這些說法一直流傳至今。因此我想，當我們要回應的時候，是否更應該只集中於我們社會某些潛在已有的說法，而不是匆忙地為這些未作深入討論的說法下定論，並將之歸類為某一方的說法？若我們集中地去思考眾數的可能，或許是更有益的討論。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梁啟智：美國明尼蘇達大學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博群計劃高級項目經理，專欄文章見《明報》。】

## 《多元民主運動的可能性》

評論人：林藹雲（標題為編輯所加）

梁啟智主要提出了兩個問題，而這兩個問題恰恰也是我想問的。例如，甚麼是嚴格意義上的行動？這一點我在閱讀文章的時候已經充滿疑問。其二，是陳允中提過了兩個術語，「開放本土」及「土著本土」，而周思中又再提出一個「解殖的本土」，那他是否想指出其實有許多本土的可能？

很多人對眾說紛紜的情況的憂慮越來越明顯，但我的憂慮並不如大家強烈，這可能是因為歷史的原因，始終我的年紀也比較大。我覺得香港政治化的情況一直以來都存在的，只是中間被括弧懸空了。比如六七十年代的六七暴動，當時的左右派對峙，階級鬥爭也是十分強烈的。六七被鎮壓之後，進入七十年代，香港本土其實一直都存在著解殖、反殖民的運動。又例如中文運動，就是一個反殖的本土運動的一個明確例子。剛才梁啟智也說，本土加s的本土眾數想像，可以從七十年代開始追溯。七十年代還盛行著十分強烈的文化思潮，例如大學曾有引入外國的理論來討論中國的問題，當時所引發的思潮激盪十分厲害。

至八十年代社會開始討論回歸的問題時，社會上的政治對立也明顯比現在強好多。記得我小時候是住木屋區，當然是和附近同住在木屋區的小孩一起玩。可是，突然的一場股災，隔壁鄰居的家長突然叫他們的孩子不要和我談話。為什麼呢？只是因為我有家人在《文匯報》裏工作。但是，僅是這一點點的對立，卻導致連小孩之間也互不溝通和一起玩。所以現時所說的對立，例如在Facebook上所見的對立，其實對我而言根本不算甚麼。直至八九之後，因為大家都是共同處在一個反共的環境裏，卻反而令整個政治大環境變得一元化。大家都本著「我們要反共，因此要發展本土的民主」的心態，當時更有文章是在批判八九之後，尤其因為要發展本地的民主政制，因此吸納了許多在民間機構工作的精英加入政府，卻反而削弱了民間社會的發展。

其實十年前，社會就八九民運事件以及八九之後，對香港民主化的發展已經充斥著批評，批評指出，整個政治環境的發展太過於單一，階級議題的缺席，也未有對許多從新自由主義引申出來的議題作處理。就連陳雲所提及的離地中產，我們早在十年前就已經提及。又例如羅永生在兩、三年前提出的虛擬自由，現在陳雲其實也是在重提而已。



依我印象，回歸之後社會其實一直充斥著許多爭論，例如我們曾批評民主黨或一元的民主派。當時我們的評論都是在專欄上發表的，記得有次我們只是稍稍對司徒華華叔作了一點批評，我們整個專欄「遊牧視野」就被刪除。由此可見，當時的政治對立是去到一個怎樣極端的狀況。

另外，我們是不能不去面對realpolitik的問題的。我覺得周思中把陳雲的realpolitik看成是一種等待，或是一種不變，明顯是有點牽強了。我覺得陳雲是不斷去appropriate一些文化經驗，比如定義香港人是怎樣，國內人又是怎樣。他是通過這些appropriation，重新界定了甚麼是香港人，也在這個過程中，不斷把一些標籤派給他的對手。例如剛才提到的「左膠」，或公民黨被標籤上「離地中產」，又或是剛才提到的「大中華左膠」。而這種標籤處處的狀況，可以說成是分化，也可以說成是政治多元。不能否認的是它的確改變了政治的格局，打破了剛才所說自八九以來好像過太偏向一元化的民主運動。因此，我們要問的是，我們在這處境下，應該如何去經營現在的這一個運動？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 《甚麼是香港自主性的體現？》

回應人：周思中（題目為編輯所加）

我一直在思考的問題是，如果「主權回歸」、「恢復行使主權」等等標籤或命名，未能真正指出九七年七月一日的意味，那問題究竟是甚麼？我想到的是「自主性」：九七年七月一日與「自主性」的關係應該是甚麼？或者，「自主性」的脈絡及指向是甚麼？有兩套庸俗的說法：一套是懷舊，我們要對抗中國大陸，擁抱英國殖民統治的一套。但這是一種「自主」的體現嗎？另一種思路就是針對過去的殖民統治，現在就要回到大陸，完全擁抱發展大計。但這是否就是通過抵抗以前英國人對香港的殖民統治所引申出來的「自主」呢？我一直覺得這兩種都不是真正要採取的方法。但是，假若以上兩種都不是，那麼我們尋找、追溯「自主」的參考點又應該是在什麼地方呢？

雖然來回往返，話題好似有點走遠，但是要特地提到二十世紀初的歐洲歷史，其實就是想去思考這個問題。我的文章用了大部份篇幅來討論盧卡奇、列寧等等的歷史，其實就是想指出一種關於意識的問題。盧卡奇是一個列寧主義者，但他[自己]有兩個重要觀點：其一是工人作為工人不必然與生俱來是有階級意識的，階級意識並非收取工資的人必然有的一種意識。反之，工人階級意識通過鬥爭而被創造的。第二，革命條件的存在不在乎有幾多人對觀點表示支持。例如，並不是要五百萬香港人都對某一觀點表示支持，革命方能成功。對於盧卡奇來說，革命的觀點是需要被創造的。而且，眾所周知，俄國的革命過程也不是先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再發展至工人階級革命。而列寧其實就是做了這方面的跳躍，所以他的革命意志並不是建立於假設全俄國人都是工人，而這些工人又被資本家剝削得十分淒慘，亦不是要待至這一悲慘的境況真的實現了，並且全民都支持布爾什維克，才能發起革命。

我嘗試簡單地、抽離語境地指出這兩種關於意識的觀點，想想是否現在我們可以拿來思考回歸後的香港情境。我對於陳雲提的那種所謂realpolitik有所保留。因為根據HKAM的總綱，香港是要等到中國解體後，才有成為城邦並擁有自治的條件。換言之，直至中國出現解體以前，香港也未能自治。在這出現之前，散播仇恨及構想他的區隔政策就是這過渡期內的一切政治行動。這種想法要達致的是還未有「自由行」時候的那種香港格局。香港亦只有在中國解體以後才能乘機成為自治體。而這種自治體得以維持，按他的說法主要依靠香港的金融地位，作為內地人的財富代理人，以之要脅中共政府不去干預香港的內政，只有這種關係才能保持香港的自治，依我所見，這就是等待。這種主張所描述、夢想的狀態是一種靜態，甚至根本不是政治，因為政治必然是動態的。為什麼說這是靜態？因為只有在香港出生及土生土

長的才是香港人，其他人統統不是。分別本土與非本土的準則是生物性甚至機械性的。這些主張沒有想過創造，或突破現時要不就是懷舊，要不就是擁抱大陸的那種香港人身份的困境。是這種對政治的假設，讓我想到二十世紀初共產主義者一些對「政治」的思考資源，是否可以被用在當今語境以作參考？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我在尋找及整理二十世紀初一些背景或歷史的資料時，也當然意識到直接並置左派政治與解殖及本土政治會有某些限制。其實我也是有猶豫過。為什麼呢？譬如，列寧是要把封建政權革掉，或是推動一個國際性的革命。但是，回到香港語境，當我們談及解殖，不論是革命也好，解放也好，目標或終點是什麼呢？這一點我到現在還是沒有定論。但是我覺得我們可以回到起點上思考。譬如用我文章的例子，香港的金融系統是否可以成為我們的反省對象？我們的反省對象是否包括我們香港那個好有效、好公平、並能生產好多財富的金融系統？這一套成功的金融系統似乎成就了我們香港人很自豪的一部份，但亦為我們指向了不歸路。

其實我的文章並沒有去想過「怎麼辦」的問題，因為我實在沒有能力思考這一問題。但是，我覺得我們在思考「怎麼辦」之前，我們應該由哪一點開始想起呢？似乎從天星皇后至今，可能是我們的文章流通量太低，或我們所寫的文章太迂迴，我們至今也未能對思考起點的定位作出一個好好的溝通和討論，所以才導致香港在討論本土是什麼時，會跳過歷史的思考，旋即進入是向香港效忠或是向內地效忠的二元選擇上。因為我們跳過了對定位的討論，我們可以不假思索就可以靠邊。這全是因為我們的討論中缺乏了某些相當重要的部份。因此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作一點點說明，特意引用一些「較遠」的歷史，目的是想提出這個歷史部份的重要性。

另外我再回應一下實際的政治效果問題。讓我回到現實生活的議題上，正如最近的統計數字顯示，香港現有十七萬的市民都是住在棺材房的。我會想究竟城邦論者會怎樣回應這件事。城邦論者當然會歸咎內地人到香港把樓價都炒高了，一定都是內地人不對。但是我也在想，如果跟香港人說，不要再去把樓價炒高，又到底會有多少香港人願意接受？假若我們真的有能力把所有內地人都趕走了，香港內部難道沒有「趁低吸納」的能力麼？依我一直認識的香港人，不論是買樓保值又好、炒樓也好，現在所生成的負面情緒都是源於先前馬老闆所提到的所謂龐然大物的到來。其實香港的制度一直以來都未變，只是現在的參與者多了，及這些新來的對手不論是誰，他們的資本能力都更勝一籌。若以城邦自治論來定位本土，結論可能只是簡單地把問題一直推延。的確我們是可以把敵人定性為內地人，但是這些都不是問題的核心，問題的本身在內地人「入侵」香港以前已經存在。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 《承認本土主義帶來的改變》

評論人：葉蔭聰（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覺得我們在討論開始之前，要弄清我們正在討論什麼。如果純粹針對某一種本土論述，單純評論這套論述沒有能力去理解一些宏觀的問題，例如全球經濟的問題，或香港的角色或定位，那我覺得這其實並沒有必要去討論。最終，本土理論不是一個能夠去解釋所有問題的理論。我比較有興趣的是，這些新興的本土論述在香港到底有意味著甚麼？它們在香港產生的政治效果又是什麼？

大家都愛以「現實政治」為討論重點，但是，我認為很多回應對「現實政治」是有一點點誤解的。現在香港有人討論「現實政治」，但意思都不是一般所理解的「務實」政治。它其實是在另一個完全不同背景中發展出來的討論。十九世紀德國關於「現實政治」的討論，是保守派及保皇派，例如卑斯默麥或威廉一世等等，為了回應1848年歐洲革命而發展起來的。他們想著如何以一些政治的方法去打造一種國族的想像及認同，他們出自政治的考量，籌謀著如何把一種對族群的政治想像，轉化成對國家的想像與認同。

今日香港有人用這個概念來談論香港，但我覺得有點怪異，因為香港始終不是一個國家，提倡這些東西的也不是掌權的政治領導人。那就變成十分複雜。一個來自民間的人又如何能理解及重新詮釋這種有關「現實政治」的論點？

不能否認，在香港大講現實政治的人，它的確提出了一種新的政治向度以供我們思考。也可以見到，它既有對族群的想像，也有對政治的考量在內。也是由於這個原因，當你回應它某一點時，它就會轉向另一個方向；但當你回應它的另一個方向時，它又再轉向，它是一件不斷轉向的意識形態東西。但是我們必須承認，它在香港的確產生了一定的政治效果，甚至帶來了政治轉變。我同意林藹雲所說，我們不應只是簡單地把這種本土主義，看成是對現有秩序的一種維護。它的確改變了一些事，即使所改變了的東西或許是我們不能同意的，但我們不得不承認它的確改變了一些事。承認這一點是相當重要的。因為如果我們永遠不去承認它的確改變了些什麼，那我們只會沿用過去批評一些保守主義的觀點，把它們理解為只是為了維護建制，為了保護現有的一些東西。但當然，它並未能真正改變香港現有的現狀。比如過去我們並沒有如「光復上水」這樣的運動。這些運動所產生的實際的政治效果又是怎樣？我們需要討論，而不應該再只是挪用過去批評保守派觀點的東西來理解這種新的轉變。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葉蔭聰：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高級授課導師，獨立媒體（香港）創辦人之一。研究課題包括文化保育政策、社會運動、新媒體及公民社會。】**

## 《未來時態下的覺醒想像》

文 / 余振雄

2012年反國民教育運動，打出了「全民覺醒，栽種未來」的大會標題。在這次運動中，彷彿，一下子地，全民又覺醒了！在運動進入沸騰之時，專欄作家安裕亦以〈覺醒〉為題撰文。這篇文章從倫敦奧運與北京奧運相比較開始，說到一國兩制，說到英美的公民教育，說到覺醒，最後以魯迅先生的《吶喊》寄語作結。其中在論及香港市民對中央政府落實一國兩制時，如是寫道：

「信任到了2003年出現根本變化。一場SARS疫潮和經濟低迷，董建華治港欠善帶來五十萬人上街，之後便是中共老實不客氣把手伸過深圳河。區議會立法會選舉都有中共的影子，人們開始驚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五十年不變』的承諾到底貶了幾分。原來，承諾真是會變的，那是陳夢吉對荒唐鏡式的咬文嚼字捉字虱——說一國先於兩制；港人治港的是身份證上的身份確認，只要住滿七年就是港人，就可以治港。」[1]

安裕的〈覺醒〉除了說明了國民教育情理皆欠奉外，更重要的是，它也為到主權移交後十五年做了一次簡單的歷史回顧；而為反國教運動的「覺醒」追本溯源，便又回到了2003年的7月1日的大遊行。這整整的十年，與主流官方以「回歸」年作為分水嶺式的經濟發展論調很不一樣。恰好將時針撥回至零三·七一那次遊行的發生，才能讓我們看見接著發生的一場場社會運動，與那「繼續繁榮穩定」是如何背道而馳，並重新打開對未來想像的可能。本文嘗試將焦點放到由零三·七一至今十年，綜合地分析這段日子對治理的邏輯如何，以及我們可以想像的未來又如何。

在過去十年裏頭，香港發生過好幾場大型的社會運動。其間，我們都會像安裕一樣，以「覺醒」來形容參與其中的香港市民以至香港社會整體。「覺醒」遂變成用來解釋激情、激動和人多的形容詞或註腳。但有趣的現象是，何以每次群眾在街頭出現，我們還會繼續重覆說著「市民覺醒」？當我們說「覺醒」時，所提問的其實是一個關於覺醒的程度問題？今次「覺醒」是否暗示我們以往的覺醒其實是假的？我們根本從未醒來？還是我們是半睡半醒？又或是醒了又沉睡？早兩年，有學者曾慨嘆主權移交「廿多年來，看著潮起潮落。曾經多少次我們以為人民覺醒了，像零三·七一，倏忽他們又沉睡了。」[2]我想，這裏無不充滿了抑鬱：過份一廂情願地希望民眾運動往某種應然的政治藍圖方向走，但卻未能如願。

但就算多少失望都不能否定香港市民確曾覺醒的事實。所以真正的問題大概是，我們究竟應該怎樣理解那一次又一次的「覺醒」，以及，覺醒之後，人潮從運動空間退卻回到日常生活後將要如何。

### 無以名狀的群眾覺醒運動

意大利哲學家佐治奧·阿甘本 (Giorgio Agamben) 曾就當下對群眾運動的理解感到過納悶，因而做過一次很有意思的思考。[3] 他借助德意志法學家施密特 (Carl Schmitt) 於1933年的著作 *Staat, Bewegung, Volk* (State, Movement, People, 該書的副題為 *The Tripartition of Political Unity*) 作為討論這個問題的基礎。在該書中，施密特嘗試清楚地定義，「運動」這概念在政治憲制中的功能如何。當然，我們都可以猜到，施密特研究國家、運動及人民之間的關係，是為要建立一套理論為當時的納粹政權服務。而阿甘本的做法，就是要指出這個極致的理論系統的局限，與及其普遍性。

施密特認為，國家是處於靜態的政治一邊 (static political side)；而人民則在另一邊，意指從幽暗之處受運動保護而滋生的非政治元素 (the unpolitical element that grows in the shadow and under the protection of the movement)；最後，運動則是與國家社會主義黨及其方向一致的動態、實在的政治元素 (political element)。這裏，國家元首則只是運動的個人化呈現而已。

對於這三者相互的關係，阿甘本首先留意到的是，運動的發生是在成為非政治的人民的功​​能之內。換言之，運動一旦成為決定性的政治概念的時候，人民作為非政治性的成份便同時不復存在。職是之故，若我們以傳統的觀念去想，認為民主就是人民作為一個政治體 (political body) 所構成的話，那麼當運動興起的時候，民主便終結，因 (非政治化的) 人民已不復再。所以阿甘本認為，「民主運動」本身其實是一個內部矛盾的說法，運動的概念其實已預設了人民作為組成政治體這概念中的虧損 (eclipse)。

此外，阿甘本亦指出，自十九世紀以後，我們便進入了生命政治 (biopolitics) 的年代。人／人民被理解為人口或生物而徹底地被視為非政治性的大業已然完成。在這樣生命政治的環境下，人人都是傅柯 (Michel Foucault) 所說的生命政治實體，而運動也就自然不過地發生且是必然的事，因為衣食住行無一不是政治。在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究竟可以怎樣繼續思考運動行將變成一個難題？因為施密特對運動的功能 (也是我們一般所想像的功能)，是要將非政治化的人民／群眾變得政治化，所以運動在生命政治的泛政治環境下，還有甚麼意義與作用？若有，那將會是怎樣的呢？[4]

最後，在施密特的議程內，要使非政治的人民透過運動轉變為政治的人民，其中必要有一種決斷的終止（caesura），而這終止的發生就是透過族群矛盾來製造出來的——即不斷界定敵人。即是，運動的政治元素究竟從何而來，以令非政治的人民終止其非政治性？歷史上我們看到，透過排他的終止以成就運動的做法，也成就了納粹與法西斯的發生。或許我們會說這是一個極端的結果，也並非必然地在運動中發生這些人類的災難。然而，阿甘本想要點出並不是運動帶來甚麼結果，而是在運動中，存在著政治決定非政治，政治的運動決定非政治的人民。在今天，政治這種凌駕性想像，可以是族群，也可以生命政治中對人的治理。

以阿甘本對施密特就國家、運動、人民的分析中，我們或者可以意識到，發生在香港過去十年的社會運動，其實大都是在施密特就人民、運動、政治和非政治的分析中打轉。例如我們都會認為，一場場讓我們（市民本身）感到「市民覺醒」的運動中，像2003、2004的七一大遊行、2010年的反高鐵包圍立法會、2012的反國民教育運動，都是市民自發的，甚至始料不及地現於眼前的。對此，我們都有一種無法理解，不知從何談起的困惑；而至今我們亦未有一種令人滿意的說法，來解釋為何有十二萬、四十萬、五十萬人走出來，而不是更多或更少或其他。再者，我們所謂的「覺醒」，其實也是對非政治性的人民投入運動中然後成為政治的人民的理解，[5] 而其中，我們仍是抱持著以政治或政治運動來定義及決定（非政治的）人民的做法。這樣的想法，不單說明了我們對運動的興衰成敗十分在意，而且骨子裏也絕對化了繼續運動的必要性，認為我們要努力繼續去喚醒沉睡中或再睡著中的群眾。阿甘本對此的提醒及他所感興趣的是，要重新將焦點置放於如何思考運動本身，而非不斷地去想如何達成運動的目的，然後埋單收場；更重要的是，沉睡的非政治群眾，其實並非一無是處，等候政治覺醒的人來拯救的。

因此，阿甘本借亞里士多德對運動的解釋，試著提出一直被忽略及排拒於政治以外對運動的重新理解。在亞里士多德那裏，動力（kinesis）是與潛能（potenza）和行動（act）有關的。他更定義運動就是潛能作為潛能的行動（the act of a potenza as potenza），重於行動的路徑（passage of act）。此外，運動是沒有終結的未完滿的行動（imperfect act without an end）。阿甘本如是理解運動，便與連繫於目的論及搞運動（Toni Negri在談論運動中常說「生產力」）的想像截然不同、恰恰倒置。因此，運動本身便不再是主體／主位、組織、面向人群、或將人政治化的事情。

從有形無實到有實有形的覺醒

香港在密集的「覺醒」同時，強烈的失敗和失望也共生。在判斷導致我們不斷覺醒又不斷抑鬱的原因，除了是我們對運動的想像過份地也過快地要一戰定生死，以政治決定非政治外，我認為分析自零三·七一以後的管治理性，亦有助我們理解當下這種特殊的社會精神反應。



眾所周知，自零三·七一以後，中央對港政策出現了明顯變化。香港前中央政策組首席顧問劉兆佳在新近出版的《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中，提到「二零零三年香港發生大規模的反對《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的示威遊行後，中央開始調整對港的不干預政策，爭取在基本不干預的前提下能夠「有所作為」，在必要時清晰闡述中央的立場，並在香港動員愛國力量反制反對派。」[6] 在這「有所作為」的治港方針下，同時發生的是一連串經濟「救港」的政策出台。接著下去的歷史發展，便有兩年之後（2005年）董建華因腳痛而下台，換上了民望頗高的港英時代官僚曾蔭權；接著是07/08普選由中央釋法後繼續「循序漸進」；再到最近兩年，曾蔭權在民望燃燒殆盡後，中央換上了一位要在施政過程中加入考慮大陸感受的新特首；中港矛盾的戲碼愈演愈烈，懷舊和封閉的本土意識獲得滋長的土壤。

若說零三·七一是香港市民覺醒的起始點，那麼，與這起始點同時發生的，是中央政府對香港事務在「必要時」進行干預的權利。我們從此亦活在一種一國兩制正在受到嚴重損害的危機陰霾中。然而，這種事情卻不一定要像依照編好了的劇本發展下去，我們也可以有其他可選擇的思考進路，[7] 以對抗與日俱增的恐共意識，及集體性地跌入積極犬儒的循環狀態。[8] 這樣說不是要否定零三·七一後中央對香港的管治方針確有轉變的事實，甚者，我想提出，我們其實都忽略了這種干預的轉變及發生，早於零三·七一前（主權移交時或更早）已隱含在法律之中，伺機待發。

歷史之於我們，從來都不是光著身子的客觀存在讓人欣賞，而沒有我們主體置身其中的因素。我們或會愈是投入便愈感困憊。政改之途屢屢觸礁，佔領中環爭取2017普選特首運動舉步為艱；民主派力有不逮，遠遠落後於民眾運動之後；在這種強烈的社會集體抑鬱下，在已然發生的生命政治滲透中，我們都活在全面政治化的思想擠壓內，耐性殆盡，急就章的你死我亡由網絡擴散到日常生活去。面對如此局面，我們是否就只能在懷舊—自戀，又或是犬儒—現實的兩極裏回應必然失敗的處境？阿甘本對亞里士多德關於運動之說，可以怎樣再深入思考作為我們想像覺醒的出路？

#### 例外狀態

其實，「覺醒」一詞本身就是帶著一種姍姍來遲之意，而它的到來，就好像班雅明所說的彌賽亞時間橫刀進入歷史之中一樣，是一種時間的殘留物（resto），終止了種種不證自明的發展主義因果定理的同時，也開啟了一種均質和空洞的時間想像（Empty and homogeneous time）。[9] 我們若只視「覺醒」為深深依附在人數之上有形無實的感官刺激，或是一勞永逸的革命之後的新天新地，而忽略了覺醒之後其實要叫我們看清這個世界的

真相是一道不能修補的裂縫，認識到它運動的過程 (means) 是沒有終結 (end) 的事實；如是去思想新生命，便不會認為明日或運動之後便是一個世界終結時 (eschaton, the end of time)，反之，我們透過彌賽亞永恆時間的介入與開展 (the time of end)，完好的保留了事物的潛能，保守了對未來的想像可能。

阿甘本清楚不過地指出，「例外狀態」[10] (或「緊急狀態」) 是現代生命政治的管治範式 (paradigm)。他所說的「例外狀態」並非指到日常生活中的例外；恰恰相反，我們的日常本身正處於「例外狀態」之中，正如班雅明在《歷史哲學總綱》中第八段所說的：

「被壓迫者歷來的遭遇告訴我們，我們目前所處的『緊急狀態』不是非常情況，倒是慣常情況。我們必須形成一種與這樣的認識相致的歷史觀。那樣，我們就會清楚地意識到，我們的任務就是要促成一種真正的緊急狀態，這將改進我們在反法西斯鬥爭中的形勢。法西斯主義之所以有機會得逞，原因之一就是，在進步的名義下，反對者把它看做一種歷史的常態。時下人們對我們正在經歷的事在二十世紀『竟然』還能夠發生，感到不可思議。這種態度不是哲學的態度，這種態度不是覺悟的開始——除非是這樣一種覺悟，即導致這種態度的歷史觀是站不住腳的。」

香港背著零三·七一後中央政府要「必要時要有所作為」的無形重壓，不斷猜測中央意旨，不斷自我調整配合。我們或會說這是現實考慮、務實作風，但現實和務實都不過是失實的同義詞，因它必然是活活將事物本真的潛能一下子轉化為政治的實現，令事物變成二元對立的政治關係，也排拒了非政治化狀態的其餘潛能的行動 (act of potenza)。由於中央政府的“有所作為”並非權宜援兵之安排，而是成為了常規 (rule)，這樣，「例外狀態」便不再是也不能是單一事件偶一為之，而是每時每刻都影響著香港整個城市的客觀現實。再次，我們看見了我們的思想在只有發展、目的論的行動上來決定一切，包括我們對未來已失去繼續想像的時間—空間。

在此，我們稍為借用法語中兩個用作說明「未來」的字，來解釋阿甘本提出對「例外狀態」成為常規的世界下的生命形式。法語的「未來」可作futur，或是avenir。futur是指由現在延續下去的未來，是一個可將既存的寄望全面實現的未來；而avenir較多指一種基進的斷裂 (radical break)，是與現在的斷裂——即未來不會像我們想像中地發生，或不在我們當下的預計內發生。[11] 面對著香港政治重壓及對現在感到失望與抑鬱下，我們大概都應從「覺醒」中找尋真箇的「覺醒」，不要老是想著明天或是次運動後便可收工，便是大團圓結局。阿甘本所提出彌賽亞的時間，正是像法語的avenir一樣，是要為期望未來的偶爾來臨而跟現在分手的一種時間想像。若我們以為阿甘本所提出的means without end這種對沒有結局的未來想像是一種消極意識的話，我們大概要倒過來看，這其實才是一種對未來承擔負責

任的想像，因為他從封閉的時間中解放了未來，讓生命得以活著，為未來奮進。而這樣的開放未來，正是對常規化了的「例外狀態」的倒置。

## 小結

全篇文章試著透過阿甘本對「運動」及「例外狀態」的剖析，作為香港社會自零三·七一至今十年就不斷「覺醒」、但卻愈來愈抑鬱與絕望的精神反應進行再思，期望打破藉「覺醒」只為刺激我們行將或已然絕望的官能，重新開啟對未來的開放性。

我們看到，零三·七一之後，中央政府對治港方針的轉變，「必要時要有所作為」猶如常規化了的「例外狀態」終日影響著香港這個城市，更甚者，它使整個社會高度政治化，產生許許多多二元的對立關係。然而，阿甘本並非要和稀泥地去走中間路線，他的哲學工程是要重新說明，政治行為若擁著某種目的論及發展主義式生命政治的理性運作，其運作的基礎與參照，正是那被扼殺了的事物的潛能（potentiality）。對政治的想像若能看到對立並非像二元（di-chotomies）而像二極（di-polarities）；並非實質（substantial），而是張力（tensional）；這樣我們所能看到的，將會是一個潛能場域，像物理學一樣，在那裏是沒有可能畫上一條清晰的線以明確地分隔事物的。唯有透過這對潛能的再思考與投入，我們便能一下子進入未被封閉或不被說死的界域（zones）裏，其中，「例外狀態」只不過是諸界域中其中之一而已。

最後，我想引用阿甘本在The Coming Community中，記載班雅明的一個故事作結。大抵，這也是一個對未來的開端，彌賽亞時間的介入。

“The Hassidim tell a story about the world to come that says everything there will be just as it is here. Just as our room is now, so it will be in the world to come; where our baby sleeps now, there too it will sleep in the other world. And the clothes we wear in this world, those too we will wear there. Everything will be as it is now, just a little different.” [12]

---

[1] 安裕：〈覺醒〉，《為下一代覺醒》。頁30。

[2] 馬嶽：〈寫於五一七〉，《明報》。2010年5月17日。

[3] Giorgio Agamben. 'Movement'. Uni.Nomade. Seminar War and Democracy. March 8, 2005, English, Translation by Arianna Bove. 引自<http://www.egs.edu/faculty/giorgio-agamben/articles/movement/>。下載日期：2013年5月10日。

[4] 在文章內，阿甘本認為這些問題是Toni Negri等大講特講multitude的學者需要回答的。

[5] 以香港的脈絡來說，我們會說非政治性的人民為政治冷感，平日不關心政治，甚至討厭政治的市民。

[6] 劉兆佳：《回歸十五年以來香港特區管治及新政權建設》(香港：商務印書館，2012)，頁49。另參張炳良：〈香港身份：本土性、國族性與全球性的交織〉，載自呂大樂、吳俊雄、馬傑偉編：《香港·生活·文化》(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頁11。

[7] 這裏，我認為陳冠中嘗試提出了一種與這種因果關係不同的論述。他有別於從純粹約化了的的中與港的管治關係角度出發，來理解一國兩制實施的可能性。他認為一國兩制在中港雙方的現實條件下，都有著眾多足夠且穩定的力量去維持、互補地推進著。而縱有一些對中央的不信任發生，這種本於全球大局穩定而成的眾多力量，最終也成為朝向完善兩制目標發生的助力。參陳冠中：《中國天朝主義與香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2)。

[8] 安徒：〈政治的鬧劇與民主運動的災難〉。《明報》。2005年。安徒在該文指出，「事實上，不單只泛民領導對群眾運動抱犬儒態度，群眾對泛民主派其實也抱犬儒態度。他們一方面既不相信他們這些偶發的行動可以動搖建制，另一方面也不相信或者寄望民主派政客可以有效地為他們爭取到些甚麼。零三年之後群眾的積極主義和犬儒主義並生並存，形成一種極之吊詭的犬儒積極主義(cynical activism)[即以犬儒的態度投入政治行動]或積極的犬儒主義(activist cynicism)[即以有限零星的政治活躍行動來體現對整體政治處境的犬儒無奈狀態]。就如在普選大遊行的時候擠在維園的人群，可以靜候而不發怒，無甚焦灼之情，當主持人喊叫重重複複的口號，甚至因無話可說而歸於沉悶尷尬之時，群眾會自行讀報或與伴閒談，仿佛遊行策劃者要說些甚麼話，根本也不理會。但他們仍然是堅定、積極的，因為他們決心要出發、並走畢全程。」

[9] 參「猶太人是被禁止探索未來的。然而，摩西五經和禱告卻教他們記憶。這就剝去了未來的魔力——所有到卜卦人那裏去尋求啟示的人全都是屈從於這樣的魔力。然而，這並不意味著對猶太人來說，未來就成了均質的、空洞的時間(empty and homogenous time)。因為每一秒的時間都是一道彌賽亞可能從中進來的狹窄的門。」(班雅明：《歷史哲學總綱》，第十八節乙)

[10] 阿甘本對「例外狀態」的思考，本身是沿於施密特在《政治神學》中，提出主權 (sovereignty) 最強而有力的呈現及體現，就是在決定“例外”這事情上。而他在解釋「例外狀態」時，亦特別重新講述了一場施密特與班雅明就暴力的論爭。「班雅明的思想，一般人會認為是深受施密特的影響並帶有強烈的施密特色彩。但阿甘本提醒我們，這種扣於班雅明身上的醜聞，其實並非如此。因為兩人的辯論雖然發生在1928至1940年間，但班雅明閱讀施密特的《政治神學》卻早在1921年。而其中我們可以從《德國悲刻的源起》一書中，看到班雅明對施密特關於主權理論的徵引。阿甘本指出，其實是不是班雅明深受施密特的影響，恰恰相反，施密特其實一直在回應班雅明的《暴力的批判》。究竟《暴力的批判》出現了甚麼問題，令施密特非要作出回應不可呢？爭論的地方是，班雅明提出要將未來的暴力 (future violence) 與法律分開，並視法外的暴力看為純粹的暴力，以「神聖」、「革命」來命名。但施密特卻認為沒有純粹的暴力，沒有絕對地置於法外之暴力。因為一旦例外狀態建立起來，革命的暴力就必定會在法律之內。故此，施密特發明了「例外狀態」來回應班雅明所提出的純粹暴力。」

[11] Slavoj Zizek,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London: Verso. 2012. p.134.

[12] Giorgio Agamben, *The Coming Community*. London: Minneapolis, 2009. p. 52.

【余振雄：專上學院兼任教師。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碩士。「四圍講古」成員。編著：《菜園留覆往來人》、《靈光乍現》。從事社區組織紀事、神學研究。】

## 《社會運動的靈性》

評論人：梁寶山（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先簡單地勾勒余振雄的文章的problematic出來。文章的problematic，我覺得是十分宗教性及文學性的。例如文章以引語開始，「信任到了2003年出現根本變化。一場SARS疫潮和經濟低迷，董建華治港欠善帶來50萬人上街……」，接著他講述社會運動，用一種覺醒的方式去陳述。他說這種覺醒不斷重複，覺醒完又覺醒，那麼，覺醒了什麼？而每次醒覺是指向哪裡？指向本土？指向階級？還是指向中港之間的關係？每次運動也提出不同又好像相同的訴求，但又沒有結果。

我會形容這種講述很有文學性，尤其是講覺醒這個詞，我們可以連繫到enlightenment到五四的一些論述，叫人民走出來的一些方法。其實作者寫作的目的就在後面，講得十分具體：

「香港在密集的『覺醒』同時，強烈的失敗和失望也共生。在判斷導致我們不斷覺醒又不斷抑鬱的原因，除了是我們對運動的想像過份地也過快地要一戰定生死，以政治決定非政治外，我認為分析自零三七一以後的管治理性，亦有助我們理解當下這種特殊的社會精神反應。」

人民走出來，產生的社會精神的反應是怎樣，其實就是這篇文章想表達的東西。從這一點去看，我覺得這篇文章就十分有宗教性，或者說，他在討論社會運動的靈性是什麼的問題。

在讀這篇文章時，我腦中一直浮現另一篇文章，是蔡芷筠寫的、在網上廣為流傳的《80後成日失敗青年》。我不知道余振雄在寫的時候有沒有想到這篇文章，蔡芷筠提到了她在運動裡的那種挫折感，這與余振雄有呼應之處。雖然蔡芷筠的文章最後並沒有指向一個悲觀的狀況，但她也說明了在一種運動狀態裡的精神狀況是什麼。先舉一個例子：

「在政治改革上我們其實從來也沒有成功爭取什麼，我們習慣失敗，多數只能在民眾和基層的層面上做功夫，讓多些人從另一個角度去理解社會現狀，搞集會、搞苦行、寫多張banner等所謂『吸引記者注意』的技倆。慢慢慢慢，不同朋友也開展他們的戰線，有人去了耕田，有人去佔領中環，我也在想其實應該要有新的行動方法，因為自己都開始厭倦了有事發生、吹雞、遊行、留守、清場、有事發生、吹雞、遊行、留守、清場的小輪迴。」

我覺得這段話對於回應余振雄的文章十分重要。余振雄的思考，就由這個problematic引發，去做一個理論上的探索。

到底政治何時開始，人民何時開始，或者政治何時終結，或者人民何時終結，在這樣一個輪迴裡，會否有另一個時態上的講述方法呢？我們的討論，很多也圍繞本土，也因我們參與其中。這十年八年間的社會運動，其實有很強的spatial term，講述的方式或者運作方式也很spatial。余振雄則從阿甘本的理論衍生，引出對時態上的思考，尤其是他提到例外狀態的講法，到底是我們平常的是例外狀態？還是小輪迴才是例外狀態？我們是否可以有一個回溯式的時間上的講法呢？而這個回溯式的講法，會不會減低我們在運動中的焦慮呢。我覺得余振雄在文章裏，大致上就是想講這些東西。

但我對這篇文章產生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我回答不了，可能要作者自己再引伸一下。他借用這些理論，其實是否真的可以幫助他去解決problematic？在文章中是否有一個充分的解釋？第二，文章裡面講到了一種圍繞社會運動的精神、生命及狀態，這是否可以持續下去？如果回到剛才的討論，既拋不出一個路線圖，又拋不出一個政治議題的時候，那是否只是一個浪漫的宗教情操呢？我覺得這些都是可以拿來討論的。我對近年的社運動員方式也有些質疑，我發現，現在開始有一個傾向，就是大家喜歡用一種選擇式的動員方式，即是因為時間有限，所以隨便吹水扯條幅，再抽取一些preference，而這種方式其實十分容易陷入消費式的，或者只是局限在一個身份政治中進行。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

【梁寶山：殖民地最後一代大學生。唸藝術，卻以記者身份見證回歸。浮游在當代藝術與社會運動之間。會教書、寫作、研究、做飯、坐禪和上街。曾為「Para / Site 藝術空間」、「獨立媒體」成員。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文化研究博士生、「香港文化監察」並「正念文化」成員。】

## 《時態式的社會運動思考》

回應人：余振雄（標題為編輯所加）

我想先說一下這篇文章為什麼會出現。我是從運動裡開始思考，特別是反高鐵以後，我的感受是一個由零三年的七一的運動形式到達了一個高峰，以後便直接掉落到一個低點。甚至我們越來越困難地解釋每次運動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形態。人們為什麼會走出來？而走出來的人又是怎樣的？特別是反國教的時候會碰到一個更為嚴重的問題，那十二萬人的數字到底說明了什麼？然後，從反國教開始，又多了很多其他的不同行動，例如耕田，或平等分享機會等。而我感到很困擾的是，這些行動如果真的是覺醒的話，那覺醒之前的是什麼。如果現在已覺醒，那未來豈不是不用覺醒了？當我們說「覺醒」的時候，是在說它的量還是質？這有了幾個問題，我們便來進入這篇文章。

我嘗試尋找一些理論以及觀察這個「覺醒」過程，我覺得這可以幫助我們思考得更清楚。七一十周年我們談及有關本土的問題，而我所想要提出的，是一個關於時間的問題。近年不論是社運或是其他方面，我們會談很多空間，例如，空間的戰爭，特別是在談中港融合時。我不會完全否定這些空間鬥爭中所產生的意義和價值，但我們好像少了一個時間上的渠道來思考這些東西。而對空間上的鬥爭，我們也背負着一種不斷覺醒的困惑。不斷覺醒，不斷焦慮；不斷覺醒，不斷抑鬱。而這種精神狀態的背後，會不會是我們希望一刀了斷，或者是希望能找到一個political project，即是我們能夠提出來一個問題，然後解決，例如佔中。但我們可以看到，我們是等不及的，或是會感覺不耐煩，覺得應該有一個結論總結出來，便是剛才蕭裕均所提及的線性的歷史。

我嘗試提出另一種時間的想像，便是一種阿甘本的時間想像。這種時間想像是完全與這個political project無關的。基本上，人們是不會思想這種東西，所以便是means without ends. 即是指對未來的想像，並非是一種對明日世界終結時的一種想像，而是一種我們正在面對的一種發展主義的傾向或軌跡，然後開展另一套新的時間觀念出來。即是他（阿甘本）嘗試回歸一個對時間的想像，而那種想像是一種potential，並非一種很快的，我們所想像的線性發展的那一種想像。

阿甘本曾提及一種說法，引用一個語言學家。他說，時間是什麼？時間便是一個意識、一種感受。即是我們有一個sense of time這樣的一個東西，但一路發展下來時，本來是需要空間這個concept把它表徵下來。而這裡所說的是一個時間線，一點一線。從這種表象到這種感受，阿甘本嘗試提出：這是不充足的。雖然它是很美，由一點到另一點，發展主義便是這樣



的想法，由一點到另一點，做得不好時也不要緊。我想要提出的是，這種線性是有問題的，阿甘本想要把這個問題變得複雜起來，就是把一個two dimension變為一種three dimension的東西，三維的東西。而這個三維是什麼？其實是一個兩極，即是一種bi- polar的想法，而不是一種兩極化，如現時所說的中港矛盾。如南極、北極一樣，它們之間產生一個磁場，是一個物理學的理论。在這個理论裡，便有一種新的對運動、對個體的想法。阿甘本嘗試說運動，運動是什麼？是movement，movement其實是一個人民的apolitical的一些活動。而阿甘本想說，我們需要回到一個potential的脈絡中，簡單來說，在這些定義以前，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態？這種狀態並非是一種一跳便會作為一個敵對的狀態、一種二元對立的狀態。阿甘本亦在這樣的一個思辯的過程中，嘗試提出一個例外狀態。

什麼是例外狀態？這個有一些學者如羅永生教授在早前有一篇較短的評論裏曾經引用過。阿甘本所提出的例外狀態，其實在Carl Schmitt與Walter Benjamin的討論裡就出現了。其中一個論點是，當把所有的例外狀態變成rules的時候，即是其可運作並成為一種常態的時候。而當我把這種狀態放於香港零三年七一以後，即是中共隨時能夠插手香港的事情，並能夠說出中央的立場。而這個，我認為是一個例外，而這種例外狀態一直圍繞著我們每一個香港人。所以我們現在便會想，中國大陸是什麼樣的，大陸是想怎樣等等，這種威脅成為我們今天的一些矛盾。

我們回到因果關係的因上。對一種關係的重新思考，我認為是頗為有用的方法。我認為我的文章並不是真的想要提供一個political project，相反，在一個思辯的過程中，我認為當中有些地方可能是技術上的，我們可以重新再作一個微調，然後再思考一些本港的問題。

(本文根據2013年6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